

The Growth
Illusion

经济增长是怎样让少数人变富，许多人变穷，
并且给这个星球带来危险。

《增长的困惑》第一版
1992年度国际GPA图书奖入围作品

增长的困惑

Revised and Updated Edition (修订版)

The Growth Illusion

[英] 理查德·杜思韦特 著
李 斌 姜 锋 宫庆彬 译

Richard Douthwait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增长的困惑

[英] 理查德·杜思韦特 著

李 斌 姜 锋 宫庆彬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增长的困惑: 修订版/[英] 杜思韦特著; 李斌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 - 7 - 5004 - 6416 - 7

The Growth Illussion (Revised and Updated Edition)

I. 增... II. ①杜... ②李... III. 经济增长—研究—
西方国家 IV. F1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1992 号

策划编辑 卢小生 (E-mail: georgelu@vip.sina.com)

责任编辑 卢小生

责任校对 石春梅

封面设计 久品轩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数 1—6000 册

印 张 25

字 数 443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The Growth Illusion
Revised and Updated Edition
Richard Douthwaite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1999 by Richard Douthwaite.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Lilliput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8 by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译者的话

我们今天总是被这样那样的环境问题所困扰，比如，每天都有海洋、河流被污染的事情发生，无数个烟囱、数以亿计的汽车和其他交通运输工具正在向大气中排放有害物质，温室效应的后果——地球变暖正在加速，由此带来的后果可能在未来的百年间使大量的物种消失，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有些岛国甚至会消失，而且严重的自然灾害也会更加频繁地发生。地球已经存在了几十亿年，人类也已经存在了数百万年，但仅仅在工业革命后的近两百多年的时间里，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却遭受了如此严重的破坏。这一切都是伴随着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而来的，但人类真的需要牺牲地球的环境来换得这样的发展吗？

在本书中，作者通过翔实的资料、严谨的分析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引起我们困惑的原因是人类选择了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即盲目地扩大生产和建设，增加产值，但是，没有考虑到这种扩张是否真的增加了人们的福祉，而产值增加所带来的收入增加是否真的能增加我们的选择性。

作为一名新闻记者、职业经济学家，作者并没有试图向我们灌输一种理论，而是通过确凿可靠的资料以及严谨的分析引导我们自己去环顾我们周围的世界，从而得出一个结论：人类需要一种全新的、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作者所引用的资料都来自世界权威机构或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书中所描述的经济生活中所发生的历史事件、演变及趋势涉及了美国、英国、荷兰等发达国家，像爱尔兰这种正在技术革命的浪潮中迅猛发展的国家，以及像印度这种历史悠久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在对各种经济理论进行分析中，作者更加注重引导读者进行参与以产生共鸣，这样更具有说服力。

作者在说明人类发展和环境变化方面的各种事件时，用了大量的笔墨描述了作者自己的感受或者引用了其他亲身经历过的人们留下的记录。这样，读者看到的就是真实的历史事件和世界的原貌，更容易形成反差，而且震撼力更强。

作者在利用历史数据进行分析时，不单单列举，而是把这些资料放到十

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跨度中进行比较，以便从中找出那些被我们忽略、被有些经济学家和既得利益者蓄意掩盖但又真实存在的联系。正是这些联系有力地驳斥了片面追求增长的经济理论，并且告诉我们人类真正的福祉应该是拥有一个可持续发展、收入分配更加公平、人人幸福的未来。

在一定程度上说，美国、英国、荷兰等发达国家目前所面临的发展和环境问题，我们中国将来也会面对，甚至比如化学物品残留污染、大气和河流污染以及老龄化问题，我们已经开始面对。像爱尔兰这种技术革命的“宠儿”所拥有的世界环境，我们也拥有，甚至已经从中获益匪浅。而和我们同处第三世界并且正在迅猛发展的印度所承受的人口、城市化以及文化侵蚀的压力，我们也正在承受。因此，我们能从这本书中学到的东西也就非常多了，所谓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应该借鉴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通过建立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的思维模式来引导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我们的子孙后代一个“蓝色”的地球，营造富有中国特色的和谐社会。

本书的译者有李斌（负责第一、二、三、四、五、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和十六章的翻译）、宫庆彬（负责第六章和第十五章的翻译）、姜锋（负责前言和第六章的翻译）等，其中李斌对全文进行了初步审校。

译 者

2007 年 7 月

感 谢

如果这本书不是在爱尔兰写成的，那么它可能就会完全不同了。在讲述爱尔兰的经济增长经历的章节中最初包含了我的研究，只是因为我觉得一本爱尔兰人出版的书应该包括这些内容，后来的结果是它如此关键，以至于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观点。但是，我怀疑这本书是否能在其他任何地方写出来。它是一个很大的集体的成果，不光是作者本人的作品，而且它还是一系列特定环境的产品；如果没有这些要素，这项工作是不成的。

所以，我深深地感激那些促成这项事业的人。这也是他们的书。我尤其想感谢那些在这本书的第一版文字形成过程中的每个阶段提出过意见的人。在爱尔兰，这些人是社会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布拉德利（John Bradley,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Institute），绿党的约翰·戈姆利和保罗·奥布莱恩（John Gormley and Paul O' Brien, Green Party），安塔斯的戴维·希基（David Hickie, An Taisce），阿尔斯特大学的道格拉斯·麦卡洛（Douglas McCulloch, University of Ulster）、苏珊·法瑞尔（Susan Farrell）、吉利斯·麦克拜恩（Gillies Macbain）、苏珊·明尼斯（Susan Minish）、约翰·麦克纳马拉（John McNamara）和肯·史蒂文斯（Ken Stevens），科里布保护中心的托尼·威尔德和玛丽安，滕·凯特（Tony Whilde and Marianne ten Cate, Corrib Conservation Centre），他们每人都看了两版草稿并且自愿帮我校对。在英格兰，乔治（George）和玛格丽特·杜思韦特（Margaret Douthwaite）、理查德·高尔特（Richard Gault）、桑迪·欧文（Sandy Irvine）和朱丽叶·所罗门（Juliet Solomon）都读了几版草稿，并且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文献。

在特定的章节帮助过我的人包括约翰·霍尔（John Hall）、厄尔·戴维斯和玛格丽特·费恩—戴维斯（Earl Davis and Margret Fine - Davis）、鲁特·维恩霍芬（Ruut Veenhoven）、克利福德·柯布（Clifford Cobb）、汉斯·迪芬巴赫（Hans Diefenbacher）、布赖恩·金（Brian King）、汤姆·斯塔克（Tom Stark）、约翰·韦尔斯（John Wells）、克里斯·韦尔曼（Chris Wermann）、彼得·沃伯顿（Peter Warburton）、利比·里昂（Libby Lyon）、玛丽·戈勒姆（Mary

Gorham)、格雷格·道森 (Greg Dawson)、迈克尔·坎贝尔 (Michael Campbell)、洛德·斯托达德 (Lord Stoddart)、艾伦·库舍 (Alan Kucia)、理查德·威尔金森 (Richard Wilkinson)、克伦·尼克莱森 (Karen Nicolaysen)、乔治·蒂林·史密斯 (George Teeling Smith)、基思·戈弗雷 (Keith Godfrey)、沃尔特·耶勒里斯 (Walter Yellowlees)、埃里克·米尔斯通 (Eric Millstone)、塞西莉亚·阿莫林 (Cecilia Armelin)、格温尼·里昂 (Gwynne Lyons)、布·巴斯金 (Boo Baskin)、帕迪·罗 (Paddy Roe)、莱奥纳多·纳尔逊 (Leonard Nelson)、O. P. 斯蒂诺 (O. P. Steeno)、伊丽莎白·卡伦 (Elizabeth Cullen)、戴维·巴克 (David Barker)、邓肯·多默 (Duncan Dormor)、尤金·佩克尔 (Eugene Paykel)、克里斯·韦兰 (Chris Whelan)、迈尔·希尔曼 (Mayer Hillman)、詹妮·伯纳德 (Jenny Bernard)、莱斯利·韦伯斯特 (Lesley Webster)、F. 史密斯 (F. Smith)、保罗·埃弗里特 (Paul Everitt)、菲尔·杜思韦特 (Phil Douthwaite)、海伦 (Helen) 和罗伯·布里奇斯 (Rob Brydges)、乔纳森·哥尔舒尼 (Jonathan Gershuny)、朱利安·西蒙 (Julian Simon)、尼克·斯特金 (Nick Sturgeon)、克莱尔·赫德曼 (Clare Heardman)、约瑟夫·康明斯 (Joseph Cummins)、贝丝·伯罗斯 (Beth Burrows)、克莱尔·沃森 (Clare Watson)、菲奥纳·韦尔 (Fiona Weir)、特蕾西·赫斯洛普 (Tracy Heslop)、鲍勃·杜思韦特 (Bob Douthwaite)、戴维·麦康奈尔 (David McConnell)、弗加尔·奥格拉 (Fergal O' Gara)、汤姆·惠蒂 (Tom Whitty)、威尔弗雷德·贝克尔曼 (Wilfred Beckerman)、罗伯特·韦兰 (Robert Whelan)、威廉·诺德豪斯 (William Nordhaus)、马尔科姆·施莱塞 (Malcolm Slessor)、杰伊·汉森 (Jay Hanson)、科林·坎贝尔 (Colin Campbell)、奥布里·迈耶 (Aubrey Meyer)、本·马修斯 (Ben Matthews)、查尔斯·克罗尼克 (Charles Kronick)、伯特·德·弗里斯 (Bert de Vries)、乔布斯特·克劳斯 (Jobst Kraus)、保罗·赫尔 (Paul Hell)、戈德·格罗申 (Gerd Grozinger)、雷恩哈德·劳斯科 (Reinhard Loske)、约翰·亚当斯 (John Adams)、戴维·弗莱明 (David Fleming)、玛丽·吉利克 (Mary Gillick)、鲁思·奥布莱恩 (Ruth O'Brien)、威廉·亚历山大 (William Alexander)、特雷弗·萨金特 (Trevor Sargent)、帕特丽夏·麦肯纳 (Patricia McKenna)、杰里米·韦茨 (Jeremy Wates)、克莉丝 (Chris) 和布瑞德·史密斯 (Brid Smith)、保罗·艾肯斯 (Paul Ekins)、威廉·里斯 (William Rees)、拉斯·费特·汉森 (Lars Fetter Hansen)、汤姆·クロス (Tom Cross)、彼得·曼特尔 (Peter Mantle)、格雷厄姆·肖 (Graham Shaw)、菲利普·麦金尼逊 (Philip McGinnity) 和安布罗斯·乔伊斯 (Ambrose Joyce)。因为在有关荷兰的

章节中的帮助，我欠了卢卡斯·瑞因德斯 (Lucas Reijnders) 一个人情，他把两个版本的草稿都通读了一遍；同时我也欠了吕菲·休丁 (Roefie Hueting) 一个人情，他的观点从总体上对这本书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除了他们俩人以外，当我在荷兰做调查工作时，米歇尔·朗恩迪吉克 (Michel Langendijk)、维勒姆·邓·海耶 (Willem den Heijer)、路易斯·德杰尔 (Louis de Jel)、马克·范德沃尔克 (Marc van der Valk)、马瑞斯·哈姆林克 (Marius Hummelinck)、道夫·博戴克 (Dolf Boddeke)、乔恩·维吉福温克 (Johan Vijfinkel)、彼得·范德尔图姆 (Peter van der Toom)、西伯勒·桑尼 (Sible Schone)、R. S. 德格罗特 (R. S. de Groot) 和玛瑞杰克·沃斯 (Marijke Vos) 花了相当长的时间，也费了很大的力气来帮助我。在有关印度的章节中，我的合作者包括芭芭拉·帕维尔 (Barbara Panvel)、维宁·佩雷拉 (Winin Pereira)、萨伯哈什·苏勒 (Subhash Sule)、杰里米·西布鲁克 (Jeremy Seabrook)、巴巴·阿姆特 (Baba Amte)、维卡斯·阿姆特 (Vikas Amte)、卢卡斯·巴布 (Lucas Babu)、伊丽扎尔·罗斯 (Eliazar Rose)、维拉斯拉奥·萨伦科 (Vilasrao Salunke)、丹尼尔·玛兹刚卡尔 (Daniel Mazgaonkar)、奥斯蒙德 (Osmond) 和伊薇特·冈萨夫斯 (Yvette Gonsalves)、苏吉特·帕特瓦德汗 (Sujit Patwardhan)、沙拉金尼·纳迪姆帕里 (Sarojini Nadimpalli)、沙拉德·约施 (Sharad Joshi)、G. 布雷特 (G. Britto)、维宁·佩雷拉 (Winin Pereira)、A. 约金 (A. Jockin)、M. D. 南云达斯瓦米 (M. D. Nanjundaswami)、P. 哈里山德拉 (P. Harischandra)、M. V. 派 (M. V. Pai)、R. L. 古皮塔 (R. L. Gupta)、维杰 (Vijay) 和沙罗约·帕鲁卡尔 (Saroja Parulkar)、维杰·帕拉尼普伊 (Vijay Paranjpye)、普雷姆巴 (Prembhai) 和拉吉尼·普雷姆 (Ragini Prem)、P. K. 萨利 (P. K. Salian)、劳特·塔卡拉姆 (Raut Thakaram) 和 B. V. 普拉米苏拉婉 (B. V. Parameswara Rao)。有关爱尔兰的章节中的文献出自彼得·尚利 (Peter Shanley)、彼得·弗拉纳根 (Peter Flanagan) 以及斯莱格的巨头 (Lord Sligo) 杰里米·布朗 (Jeremy Browne)、希拉·马洛伊 (Sheila Mulloy) 和已故的杰夫·奥马利 (Jeff O'Malley)。对我帮助特别大的机构包括都柏林三一学院图书馆 (Trinity College Library, Dublin)、塞恩斯伯里 (Sainsbury's)、伦敦地球之友 (Friends of the Earth, London)、地球观察 (Earthwatch)、酒品研究协会 (Institute of Alcohol Studies)、英国公路联合总会 (British Road Federation)、气候行动网络 (Climate Action Network)、化学工业协会 (Chemical Industries Association)、伍尔维奇建筑协会 (Woolwich Building Society)、罗伯特弗莱明有限公司 (Robert Fleming & Co. Ltd.)、绿色和平组织 (Greenpeace) 和政策研究中心 (Centre for

4 增长的困惑

Policy Studies)。

最后，我必须向我在爱尔兰的出版商利利普特出版社的安东尼·法瑞尔 (Antony Farrell) 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没有他，这本书可能写不出来；我也要向新社会出版社的克里斯·普兰特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正是他的活力和热情确保了第二个版本的出版。他们俩人对这本书的贡献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所有的贡献中，最重要的来自我的妻子玛丽 (Mary)，她不仅帮助我研究这本书中采用的方法，对每一章的不同版本的草稿提出改进意见，而且为我创造了一个写书的环境。我在此向她献上我的爱和感谢。

前 言

戴维·C. 科顿

当代的经济、政治和知识精英们都在追逐经济增长以及全球化，其狂热程度堪比中世纪十字军领袖对宗教的热情。那个时期共有的这种狂热的自以为是导致了知识霸权的形成，这种霸权将谬误和幻想奉为真理和智慧。

由于受到当代技术奇迹的迷惑，我们很少注意到自己生活的年代，在知识和精神方面是何等的黑暗；人们不鼓励我们询问更深层次的问题，以便让我们学习正统的问答式的经济问题。正是这一疏忽使得人类文明，也许还有人类物种的生存产生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

如果这种危机确实存在，那么我们就欠那些我们时代的勇士们太多了，他们冒着被定为异教徒的风险，敢于指证那些将经济增长以及贸易扩张奉为假神来顶礼膜拜的人；指证那些推行某些政策的人，这些政策实际上加剧了吞噬人类的社会和环境危机；是他们冒着遭受奚落和来自某些专业人士的责难的危险，指出了那些信徒们坚决否认的另一条出路。

我要感激这四位勇士：唐尼纳·麦多斯（Donella Meadows）和丹尼斯·麦多斯（Dennis Meadows）这两位小组带头人，他们在《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一书中向我们展示了经济增长如何使得我们与这个有限的星球的极限背道而驰；赫尔曼·戴利（Herman Daly），生态经济学奠基人，他通过解构当代经济理论来证明为何该理论会导致破坏人类和地球利益的选择，并且为我们时代一种新的经济学奠定了基础；还有一位就是理查德·杜思韦特（Richard Douthwaite），本书作者，在我看来，他比其他人更为有力地挑战了认为经济增长是消除贫困和提高总体生活质量的正统观点。的确，他证明了对增长的迷恋阻碍了这两个基本目标的实现。杜思韦特的其他独特学说还包括他认为增长往往减少了选择，依靠贸易来满足需求往往意味着国家经济的不稳定，另外他还认为，浓缩能源的密集使用与平衡法则互相矛盾。

我本人也非常感激理查德·杜思韦特。本书的第一版不仅增加了我个人对经济增长机能失常的理解，而且也帮助我找到了在写作和演讲中义无反顾地面

对增长问题的勇气。当关于这本书的消息越来越引人注目的时候，经过重大修订和更新的《增长的困惑》第二版应运而生。如今，许多人都对增长的好处提出质疑，然而，却又都害怕停止追求增长会导致人类进步的结束，使贫困人口陷入无尽的贫困之中而付出巨大的代价。本书以清晰的思路、权威的分析和对现实的深入了解，澄清了这些恐惧，其中所包含的及时而重要的信息带给读者很大的希望。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经济增长就像不受控制的癌症，随着其细胞无限制地复制，逐渐消耗并毁坏其寄主，直至寄主死亡。正如杜思韦特所说，我们在工业革命时期经历的无限制增长依赖于不断增加的化石燃料消耗。除非采取措施使人类社会摆脱掉这一经济病征，否则，随着恶性经济增长消耗掉剩余的石油，它就会像是癌症一样毁掉自身及其寄主。全球变暖将会变得更加严峻并且极具破坏性，而且我们自身的生存争斗也会变得更加绝望和有害。正如杜思韦特的观察，我们可以通过预见经济增长的极限来选择自愿结束增长，进入一种有序的经济状态，这种经济状态为每个人提供一种高质量的、满足的生活，与我们生存的星球之间保持一种可持续的平衡。

然而，杜思韦特最独到的贡献在于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论据充分的案例，这些案例说明，结束总量增长不仅有助于我们的生存，而且能够提高整体的生活质量，使人们免受交通堵塞之苦，远离有毒的环境，并且免受经济不稳定性的压力。重新定义发展并学会以更有效的方式配置地球资源，将是我们最合理的选择。杜思韦特在另一本姊妹篇《短路：增强当地经济在不稳定世界中的安全性》（*Short Circuit: Strengthening Local Economies for Security in an Unstable World*）中更深入地提出了积极变革的可能性，并为我们如何创造未来经济提出了详细的建议。如果你还没有读过那本书，在读完本书后，你一定会迫切想要阅读它。

杜思韦特的读者不应该进入这样的误区，即想当然地认为他或任何其他人都将所有的增长都视为一无是处，都应该被终止。增长是推动健康生活的必需，正如孩子成长为大人，橡子生长成为高大的橡树。然而，毫无约束的增长却是一种疾病。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即身体的生长不再增加身高，而仅仅是增加腰围；当一个细胞忘记它是整体的一部分而不计结果地无限制增长时，人们就会患上癌症。一个有机体的健康依赖于生长，然而，同时也取决于限制和引导生长，使之增强而非危害整体完整性和性能。

经济产出和消耗不受控的、差别的整体增长是危及我们未来的病征。我们需要增加商品和服务，以满足贫困人口的基本需求——同时要减少富有群体的

有害消费。我们需要增加人行道、步行街、自行车以及公共交通设施，同时要减少使用汽车、高速公路以及停车场。我们需要增加就业机会，同时要减少每个工人为谋生而必须工作的时间。大多数国家需要增加基本的公共医疗服务，减少军备支出。在这方面，杜思韦特的分析是正确的，正如经济学家当前的结论一样，在富裕的国家里，精明的增长管理的确会立刻导致福利的正增长和经济学家们现在测定的总生产额的负增长。

在这样一种危险的错觉的怂恿下，即技术使我们超越了生活本身的自然限制，使我们忘记了经济活动唯一有意义的目的就是为人们提供一种生活方式。由于受到这一错觉的蛊惑，我们创建了这样一种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那些拥有的金钱远远超出其所需的人们，他们的谋生手段只不过是挣钱行为的附属品。结果就导致在这种经济制度下，人们集体疯狂地将生活等同于金钱。

为了恢复健康的经济和社会机能，我们必须创建一种能够使金钱恢复其作为生活创造性促进剂的适当角色的经济制度。这意味着将由对金钱的热爱所驱动的社会转变成热爱生活的社会。理查德·杜思韦特的天才之处在于他能够立刻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到这两者的区别所在，同时清楚地说明恢复健康经济机能的实际措施。对于每个关心人类以及地球未来的人，这一点都是值得认真对待的。

引 言

从我开始着手写这本书以来，已经过去了几乎10年时间；自本书第一版问世以来，也有7年之久了。这段时间以来，都发生了一些什么？人们对经济增长的态度是否有所改变？10年前，很少有人就为什么要增长提出过疑问。人们认为，增长可以解救人民于贫苦之中，并且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各派政党也以不同的方式强调这些期望：左翼政党认为增长可以增加工资，提高社会福利，改善医院的就诊环境，降低学生与老师的比例，等等；而右翼政党主要强调更大的利润及更广泛的选择。

但如今，大多数人对于增长的信心已经消失殆尽，政治家们也不再热情洋溢地宣扬增长的好处。为了寻找一段好的引文用于本版第一章的开头，我用计算机搜索了托尼·布莱尔在继任英国首相后所做的每次演讲，发现他从来没有表示过经济增长与普通人的生活改善相关。今天，他和我们当中许多人唯一可以期待的就是经济增长可以提高商业利润，如果增长率足够快的话，增加额外的就业机会。然而，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由于全球化经济系统——我们加入这一系统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运行方式，我们将不得不承受较低的工资和日益增加的工作不安全感。另外，与早期以国家为基础的经济系统相比较，通过全球经济系统来获取经济增长会使我们自己和国家暴露在更大的财政和环境危险之中。

既然我们知道经济增长具有如此高昂的代价，为什么还将其看得如此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公司试图不断通过引进节省劳动力的技术来降低成本。很自然，这些技术使得就业机会减少，因此，除非经济活动总量每年增加大约3%，否则，失业率就会增加。由于关系到就业，因此，国民经济必须迅速增长，从而保持就业率稳定。

国家需要经济增长的第二个原因是，在任何时候，都有15%~20%的劳动力将会受雇于未来一年中旨在发展经济的投资项目上。如果某年经济增长停滞，投资的公司就无法增加其市场销售额，从而导致生产过剩。这将促使它们削减可能的未来投资计划，从而导致那些原本要去建造新工厂、办公室和购物

中心的劳动者们失业。由于这些新失业的人口消费减少，从而会进一步造成其他经济部门的职位消失。这将导致消费者的消费水平更加降低，进而造成更多的职位消失。简而言之，这将形成一个向下的螺旋，最终导致严重的经济萧条。世界上每个政府都害怕出现这一现象，因此，它们愿意尽一切努力来确保经济增长，无论它将会对社会或环境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早在1998年，我针对本书第一版在互联网上进行了为期一周的研讨会，有来自于50多个国家的近700名参与者，我认识到许多人将经济增长看做是虽然令人遗憾，但又必须存在的东西，它并不实惠。我原以为可能需要占用大部分的研讨会时间来达成以下共识，即无论经济增长在过去取得了哪些成就，当前的增长对普通人毫无益处。然而情况并非如此，仅仅过了24小时，剩下的时间中人们就开始讨论如何改变经济体制，以消除对增长的需求了。

研讨会取得这一结论的速度让我大吃一惊，因为我花了18个月才写成这本书并获得相同的结论——经济增长通常是有害无益的事情。我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因为我想解释这个从学生时代就让我着迷的问题——自然环境与经济体制之间的明显冲突，自然环境在承受太多的人类活动之后就会遭到破坏，而正如前面所讨论的一样，经济体制需要增长，否则就会走入萧条。我十分清楚总有一天会达到增长的极限，因为我们居住在一个有限的地球上，至少在我们所知的范围内，增长过程消耗越来越多的自然资源。我当然也知道，由于表达了这一想法，1972年《增长的极限》^①一书的作家小组受到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奚落，然而，他们的辩论增加了我的信心，即使假设地球上拥有无尽的矿藏和能源，资源短缺不会阻碍经济增长，可是，地球吸收污染的能力非常有限，它也将很快被污染覆盖。该小组认为，如果在达到某个极限点之后继续增长，污染程度的增加将会导致人类数量剧减。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有关全球变暖的证据已经开始积累，而且我还读到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Worldwatch Institute）的陈述，他们认为，保护我们免受不断上升的海平面以及其他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所消耗的资源，要远大于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能源。我当时想，“正是这样，这就是污染如何导致人口减少。我们还没有到达增长的极限，但是正在经历这一过程。一定有人正在写一本关于如何解决增长与环境之间冲突的书。”我等又等，直到1989年，仍然没有出现任何关于这方面的书籍，那时我开始考虑自己来写一本这方面的书。我的计划是研究如何阻止增长，使得资本主义制度不会崩溃或者被改变，并且使扩大产出的方式不再破坏环境。

我不认为自己可以完全胜任这一计划，毕竟我已经有15年不做专业经济

学家了。我住在爱尔兰西部的一个山脚下，从我的住处可以俯瞰到海洋，我作为一个自由记者，靠为都柏林的报纸撰写商业、财政以及环境专栏来谋生。我告诉自己，记者们每天都要撰写他们知之甚少的专题。的确，我可能会犯错误，但我尽量找尽可能多的人来阅读我的草稿，以消除这些错误。如果印刷时尚有一些错误，那就这样好了，有一本有些许错误的书来给人们评论，总比没的评论要好得多。

然而，计划写一本书和实际动手写有很大的区别。因此，如果不是一名我当时并不认识的都柏林出版商安东尼·法瑞尔，我真的不能想象这本书会最终问世。1989年，英国和爱尔兰的绿党在大选中进入欧洲议会，这让所有人都大为吃惊。几周后，安东尼·法瑞尔突然给我打电话问我是否愿意写一本关于绿色政治学的书，我告诉他这不是我的本职所在，但我很愿意写一本关于绿色经济学的书。几周后，我们就本书的框架达成协议，然后我就开始写作了。

1989年的大选也以另一种方式促进了该书的完成。在投票后的那个周日，时任《观察家报》的环境通讯记者杰弗里·里恩（Geoffrey Lean）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我为何不选绿党》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解释说，我之所以不支持绿党，是因为它们的反经济增长政策会导致经济萧条。此外，他还说，基于同样的原因，几位仔细研读过该党宣言的一流环境学家也没有投票给他们。大多数为其投票的人们都没有认识到该党究竟代表什么，如果他们知道了就绝对不会为其投票。

在接下来的周日，作家兼电视主持人迈克尔·伊格纳季夫（Michael Ignatieff）写了一篇文章作为回应，他在文中表示读过印刷精美的绿党宣言并为该党投了一票。他说：“在这一问题上他们一直都是正确的……[它们的]这一立场要先于任何人……因此，它们应该赢得选举。”但是，他认为仅仅立场正确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实际的解决办法。

如果这些反对增长的原教旨主义者绿党战胜了实用主义者，我一定会抛弃它们，因为该党不欢迎后现代世界。绿党原教旨主义者坚持认为，增长是一个由企业巨头操纵的用于控制和满足虚假需求的机器。我并不认为当代增长所满足的需求是虚假的。我喜欢增长，因为它可以为整个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带来冰箱、汽车、中央空调、暑假以及体面的退休金。进一步的增长将会将这些低级别的物品带到第三世界。我在寻找一个欢迎而并非诅咒这些愿望的环境政策。

我非常惊讶，像里恩这样每周都在撰写环境专题的记者竟然会没有认识到几乎所有这些环境问题都是由经济系统的扩张造成的。同时，我也非常震惊，

像伊格纳季夫这样见多识广的人竟然会相信我们的地球拥有足够的资源，可以永恒地使第三世界的人像西方人一样消费。事实上，考虑到他在其文章中其他部分所写的内容，很难想象为何他会提出有必要进行这种尝试。

伊格纳季夫描写了西方社会的上层人士如何试图逃避噪音、交通堵塞以及城市衰落所带来的影响，他们搬到“位于安静街道上带有花园的住宅中”，将那些“没有钱到浓雾缭绕的城市之外度周末以及无法搬离卡车震动门窗、污泥溅满窗台的街道”的贫困人口留在城市中。但是，这些潜在的逃离者发现已经无处可逃：“受到污染的天空朝着未受污染和破坏的地方移动，当我们到达居住地以后，发现污染已经先于我们抵达海滩。”因此，人们不再逃亡，转而开始进行斗争并投票支持绿党。

正是这两篇文章使本书提上了日程。我的初衷是想向里恩和伊格纳季夫以及数百万过去和现在与他们有着相同疑惑的人们解释为何经济增长是这些环境问题的元凶，以及为何即使我们采取措施限制污染，只要增长继续，就无法根治这些问题。

抛开认为应有限度地增长的观点不谈，我的一般观点也是非常传统的。例如，我相信经济增长为生活在工业化国家的人们带来了舒适的生活，并为地球有限的承载能力无法使第三世界的人享受同样的生活而感到惋惜。同时，我还相信用于促进增长的技术与完全就业的目标并不冲突，尽管有一些暂时的困难，但总体来看是朝向改善生活质量的方向发展的。简而言之，像大多数人一样，由于从小就在西方社会长大，并相信未来的物质生活会更加丰富，我也像里恩和伊格纳季夫一样，相信增长会使情况变得更好。我与他们的区别所在就是我认为应该停止增长。

对我来说，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为撰写第七、第八和第九章进行调查的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我仔细地研究了1955~1988年之间人均收入翻了一番对英国人的影响。当然，在这一阶段，我居住在英国或周边国家，感受到经济增长非常迅速。但是，我发现在这一阶段，几乎所有的社会指标都开始恶化，这让我非常震惊，并将其归咎于经济增长。一些慢性病征也在增加，例如，犯罪率增加了8倍，失业率急剧上升，有更多的婚姻以离婚告终。我近乎疯狂地寻找积极的方面以平衡这些损失。的确，住宅存量增加了，但即使没有经济增长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与接下来的几年相比，1955年兴建了更多住宅。耐用消费品也一样：如果不是技术限制，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经济就有能力生产英国在1988年拥有的所有洗衣机、冰箱以及影碟机，根本不需要任何额外的资源。只不过如果没有增长，机动车数量就不会迅速膨胀，但这终究是好